

吴雪杉
著

长城

一部抗战时期
的视觉文化史

The Great Wall:
Visual Culture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1-1945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長城

一部 抗战时期
的 视觉文化史

The Great Wall:
Visual Culture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1-1945

吴雪杉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城：一部抗战时期的视觉文化史 / 吴雪杉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3

ISBN 978-7-108-06002-0

I. ①长… II. ①吴… III. ①长城—文化史—近代—通俗读物
IV. K928.7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7059 号

责任编辑 杨 乐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张国荣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1.5

字 数 250 千字 图 247 幅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49.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献给我的父母：

吴元春 张晓春

目 录

序	1
导论	4
第一章 现代目光下的“长城”	11
第二章 1933：长城抗战与“血肉”长城	46
第三章 另一种想象：日本及“满洲国”宣传图像中的长城	84
第四章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风云儿女》的广告、 影像及观念	118
第五章 召唤声音：图像中的《义勇军进行曲》	161
第六章 新长城图像的扩散	196
第七章 无尽的行列：西方“新长城”漫画及其中国回响	258
第八章 不到长城非好汉	303
结语	332

序

我对长城的研究始于2007年夏，当时正在写《四僧名目考》，每天到国家图书馆翻阅民国期刊。当看到民国人在1912年的《真相画报》上严肃讨论长城该拆还是不该拆时，仿佛一个神奇的世界浮现在面前。后面一年断断续续查找民国文献，2008年10月到杭州“海外汉学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上以《图像“长城”：抗战美术与现代民族话语的生成》为名做了一个报告。本书的基本观念在那时就已经确立。不过2008年的我还在纠结是不是该把研究方向从明清美术史转到汉代画像石，近现代部分偶有涉猎，却没打算全情投入。长城这个题目只想写篇文章了事，每每动笔又觉得千头万绪，一篇文章无法穷尽，便搁置一边。

2011年，我后来的博士导师尹吉男教授推荐我参加汪悦进教授在哈佛燕京学社主持的一个艺术史小组，汪老师做研究纵横捭阖，看问题极具穿透力，他看我兴趣驳杂，便提前约法三章，去了只能做近现代，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个人的研究重心开始转向晚清民国，又主攻长城的图像与观念。那一年应老朋友施杰之邀，去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做了一个孟姜女与长城的报告，又在哈佛燕京学社主办的“Power, Status and Space in East Asian Art”研讨会上宣读了“日本及伪满洲国宣传画里的长城图像”，也就是本书第三章，算是阶段性成果。

2012年回国后，到中央美术学院跟尹吉男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和他商量博士论文选题。我原想把古今中外的长城图像一锅端掉，尹先生说博士论文做长城可以，但是只能选做一段——于是定下来做抗战期间的长城图像与民族话语，也就是现在这本书的主题。说起来初次聆听尹先生教诲是在1994年初进美院读本科的时候，算下来也有二十来年了。尹先生的智慧自不必多言，个人魅力也是超高，身为弟子的我唯有高山仰止。每次跟尹先生谈完论文，都觉得学术之路还很漫长……到2015年博士毕业，论文基本成形，后面又经过两年反复修改，才有了本书的问世。

我的硕士导师是薛永年先生。跟薛先生读书是在2000年，主攻明清。毕业之后在艺术史领域里东游西荡，去明清渐远，不过每有新发现和新研究，总会到先生家请教。薛先生学养极深厚，关注艺术本体，推重实打实的研究，每次向先生汇报进展，先生三言两语就能戳到痛处。这篇博士论文也被薛先生“戳”过多次，文章也越来越实在。

中央美术学院的李军教授2011年恰好也到哈佛大学访学，李老师也是看着我本科到博士成长起来的“老”先生，不过要到哈佛时才有机会向李老师密集学习。李老师理论出身，近来又打通中西艺术史壁垒，眼光锐利与老辣兼备，我从那一年开始，受益至今。老师辈里还要提到郑岩教授。我跟郑老师私淑过几年墓葬美术，做了几篇汉代文章。现在改“邪”归正，还是常常向郑老师请教。郑老师博古通今，才思敏捷，只要讨论图像问题，他就不厌其烦。

同辈友人里，对我帮助最大的是老同学邹建林。建林兄本科比我高一级，多少年来一直是我学习的楷模，每有新作，大多都要呈送师兄过目，请他指点。博士论文更不能例外，每出一个章节，都要在电话里讨论许久。于我而言，建林兄称得上

亦友亦师了。

师妹杨多是我十余年来另一位益友，在长城问题上给过很多精彩意见，又帮我查找资料，在纽约一卷卷调阅《亚里桑那州共和报》胶片，为一条材料前后就花费两三个月时间，让我好生感动。施杰最早提醒我注意日本方面的长城材料，又在芝加哥大学为我找到《圣路易斯邮报》的关键信息。美国老报纸胶片应该和中国胶片一样，会让人看到头晕眼花吧？施杰兄和杨师妹代我受苦了。汪老师组织的艺术史小组里还有两位同侪，广州美术学院的蔡涛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唐宏峰，我们三人同龄又“同班”，那时的蔡涛投身黄鹤楼大壁画，宏峰专攻点石斋，他们二位在近现代方面入行比我早，我从他们那里获益良多。在中央民族大学时的同事袁江名精通电影史，在这个领域里也给了我很多启发。

读博期间，老同学初枢昊把图书卡借我三年，让我借阅量翻倍。王燕数年来为我进出北大图书馆查阅资料提供了很多便利。需要在北大图书馆借书时，也会烦劳任楷和马丽云二位友人。吴垠帮我检索到一批材料。李燕和杨乐都从美国为我带书，那些书真是又厚又重。书中若干章节完成之后，曾烦请徐胭胭和陈婧莎两位学妹审读，令文句通畅了许多。

承蒙殷双喜、张鹏、陈诗红和李若晴等资深编辑厚爱，本书部分章节曾经发表在《美术研究》《文艺研究》和《美术学报》上。杨乐帮助我申请出版，敦促修改书稿，又花费心力编辑本书，要特别致谢。写出来的东西能够变成白纸黑字，总是让人备受鼓舞。

最后感谢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妹妹。我能够有所成长，甚至行有余力做些无关功利的学术研究，他们的爱护、宽容和支持至关重要。

导 论

在 21 世纪的今天看来，“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属于常识，这个常识还以图像的形式贯穿在当代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这个常识是怎么来的，一直没有一个十分清晰的解答。学术领域对于长城象征意义的历史建构性已有共识，但对具体建构过程的认识却一直停留在比较粗糙的阶段。随处可见的长城图像在这个过程里发挥的作用，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长城伫立在大地山河之上，历千百年而巍然依旧。它的营造和修建历时两千多年，本身就有一部漫长的历史。长城的文化意义又相对独立于长城建筑之外，来自不同群体和文化传统在历史长河中对长城的书写与言说、理解与互动。与长城有关的一切象征观念及图像表达，都是在历史中层累叠加的结果。对长城象征意义的讨论也就应该放在文化史，而非建筑史的领域之内。

迄今为止，从文化史角度研究长城最丰硕的成果是美国学者林霁（Arthur Waldron）1990 年所著的《长城：从历史到神话》。^[1]他明确提出：“长城结果是一种令人着迷的幻象，它现

[1] 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中译本在 2008 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见 [美] 阿瑟·沃尔德隆著，石云龙、金鑫荣译：《长城：从历史到神话》，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 年。本书主要使用中译本，必要时也会参照、援引英文原著。该书作者中文名为林霁。

在已经习惯性地深深地嵌入了中国和西方学术和普通老百姓的想象之中。”^{〔2〕}通过细致翔实的历史研究，林蔚区分了作为军事边界的长城、政治产物的长城和作为文化产物的长城。在林蔚看来，修建长城是一个政治问题，尤其在明代，是否建长城以及在哪里建长城，是外交政策、军事战略和政治观念相互竞争与妥协的结果。而长城的文化意义——也就是关于长城的“神话”——则经历了另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古代中国，它象征秦始皇统治的暴政；在16世纪晚期欧洲人开始关注长城之后，长城一步步演变成能够从月球上“看到”的唯一地球建筑；到了20世纪初期，“西方有关长城的错误概念”渗透到中国，长城“在日常生活中被逐渐当做民族的象征”，孙中山又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在摆脱清朝统治之后，对于一个“比其他国家更加依靠统一强大的象征和文化等级来维持其凝聚力的国家来说”，中国或者说中华文明的中心出现了真空，这个时候，“孙逸仙率真地开始将长城变成一种民族的进步象征，从根本上来说是针对这种变化的反应”^{〔3〕}。在该书的最后一章，林蔚勾勒出长城获得象征性价值的基本线索，辨析长城大致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意义上获得怎样的象征价值。

本书受惠于这本著作极深。林蔚提出的长城在历史上具有多种意义以及长城有一个“从历史到神话”的过程，都成为本书立论的前提。但林蔚在讨论长城之于现代中国的重大意义时，将两个核心问题轻轻放过了，而这两个问题恰是本书关注的焦点。

一是抗日战争与长城现代意义的关系。林蔚注意到两者的联系，提到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里的“不到长城非好汉”

〔2〕 [美]阿瑟·沃尔德隆著，石云龙、金鑫荣译：《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第6页。

〔3〕 同上书，第280—281页。

可能与抗日有关，也注意到《义勇军进行曲》与抗日的紧密联系，不过他对抗日战争在长城意义转变中的决定性作用重视不够，一些历史细节未能得到清晰、准确的呈现。^[4]此外，林霁对历史伟人孙中山的过度强调，也使他不由自主地弱化了抗日战争发挥的效力。

二是图像的作用。林霁并非不注意图像，他在论著里提到并使用了17至19世纪中国、欧洲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各类关于长城的绘画作品，却唯独忽略了民国时期大量出现的长城图像，只用一言以蔽之：“可是，大致说来，长城在民国的图像志（iconography）里不怎么出现。”^[5]随便翻翻本书选用的图版，就可以发现林霁在这个问题上的疏忽。

有两位学者部分弥补了林霁对于图像关注的不足。洪长泰《战争与大众文化：现代中国的抵抗，1937—1945》（1994）注意到是抗日战争促使长城转化成一个能够将中国凝聚为整体的象征物，不过他没有认真梳理这个转变的历史过程，只是以张仃《收复失土》、穆一龙《蜿蜒南下》等抗战期间绘制的漫画作品为例，就长城在画中的象征意义略作陈述。^[6]

高名潞在《墙：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与边界》（2006）里延续洪长泰的见解，他在一条长长的注释里批评林霁“漠视了抗日战争期间一种与长城相关的大众文化的发展”，并认为20世

[4] 林霁用一页篇幅谈论抗日战争与长城的关系（英文本的第215至216页），而如本书所示，或许一本博士论文才算充分。在具体时间点上，林霁将抗日战争之于长城发生影响的时间点放在1931—1932年（《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第281页），本书对此有不同看法，详见第二章。

[5] 原文是“By and large, however, the Wall had little role in the iconography of Republican China”, 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p.216, 江苏教育出版社中译本的译文是“可是，大致说来，长城在民国的肖像画中影响甚微”，见[美]阿瑟·沃尔德隆著，石云龙、金鑫荣译：《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第283页。

[6] Chang-tai Hung: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Berkeley-Los Angeles-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2.

纪30年代开始的抗日战争从根本上确立了长城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特殊地位，“更具体地说，把长城定位为一个民族身份的不可动摇的象征，是在日本军队1931年侵略中国东北后才被广泛传播开的”^{〔7〕}。和洪长泰一样，高名潞在史实和图像研究上也都没有更进一步的展开。

到2010年，罗鹏（Carlos Rojas）在《长城：一部文化史》里再次推进了这个讨论。他和林霁一样，过于注重精英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对于长城的解读，尤其是孙中山、鲁迅和毛泽东；和林霁一样，他也毫不涉及抗战时期的长城图像。他的进展在于，他把对长城的讨论扩展到大众文化领域，着重研究了电影《风云儿女》的情节及其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战背景下对于长城意义的建构。^{〔8〕}遗憾的是，就影片《风云儿女》而言，他也只涉及影片叙事和歌曲中体现出的长城观念，没有注意到电影对于长城形象的视觉塑造。

从以上几位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长城之于现代中国的象征意义与抗战密不可分，这在林霁以后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的普遍认识。对于这个象征意义出现的具体历史过程的模糊不清，自林霁以降也一直在延续。图像在这个过程中究竟起到何种作用，学者们大多蜻蜓点水，一笔带过。本书所要深入讨论的正是这两个问题：在抗日战争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中，长城究竟如何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由于长城本身是一种视觉性的存在，又以视觉的方式（摄影、漫画、版画等）得到再现与传播，视觉图像与长城新观念的历史建构有何种关联？

20世纪，长城以图像的方式被大规模地生产、制作，各种

〔7〕 高名潞：《墙：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与边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8页。

〔8〕 Carlos Rojas: *The Great Wall: A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报纸杂志都乐于刊登有关长城的照片和漫画。尤其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关于长城的图像——精英的和通俗的——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急遽变化。这一变化恰与长城观念的变化相一致。集中梳理、阐释 1931 年至 1945 年关于长城的各种图像类型，讨论它们得以产生的社会动力以及艺术家所付出的形式探索，不仅可以拓展中国现代艺术史的研究领域，也为讨论 20 世纪中国艺术史、视觉文化以及文化史之间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个场域。

要将长城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就要把中国历史上一座原本与“中华民族”无关的建筑物，“吸纳”到 20 世纪出现的对于“中华民族”的现代理解之中。这一“吸纳”的结果已经很清楚，本书首先要讨论的是“吸纳”的历史过程，对于历史脉络的梳理成为本书谋篇布局的一个基本线索。

第一章讨论抗日战争之前对于长城的一些基本观念，以及长城以何种视觉形象进入现代。此时的长城具有古老、伟大等正面价值，但它的“无用”也为当时人所公认。无论孙中山还是鲁迅，对于长城的理解都没有跳出这两个范畴之外。从林蔚到罗鹏等现代学者都过高估计了这两位政治、文化精英在长城问题上的原创性。

第二章是本书核心。1933 年初的长城抗战使当时人真切感受到“砖石的长城”不足以保护国家，“人的长城”和“血肉长城”等观念开始浮现出来，长城从此开始与民族、与国家有了更紧密的结合。

第三章针对抗战期间日本和伪满洲国宣传画里出现的长城形象。虽然新长城观念的发生源出于中国内部，却有一个 20 世纪全球化的语境作为背景。日本和伪满洲国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无中生有“捏造”出的长城意义及图像虽然没有在中国获得认同和回应，却与正在中国得到重塑的“新长城”观念构成了竞争。

第四章主要讨论 1935 年拍摄的影片《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影像与观念。长城与中华民族最主要的联系，“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就是在这部电影中才得到明确提出。影片从最初的宣传品开始，就借用已经在中国、日本和欧洲得到反复传播的长城图像，来“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不过，要在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新长城”的视觉图式才得到确认，并借助官方的宣传机器得到推广，这是第五章和第六章要解决的问题。《义勇军进行曲》对于长城新观念的传播意义非凡，有相当数量的绘画和摄影作品以视觉方式借用并重塑了《义勇军进行曲》，其中涉及图像、声音与观念的互动。巨人与长城组合在一起的图式出现在 1937 年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随后在 1938 年的武汉被大量印制，最终扩散到各个战区。长城图像及其观念的出现和扩散，也是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利用官方力量推动图像传播的典型案列。

第七章再次将视野拉出中国，看一个完全由人构成的“新长城”图式如何从美国产生，而后在中国发扬光大。后来所有由战士构成的“血肉长城”“钢铁长城”图像，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

最后一章将视线转移到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共产党政权也接受了新长城的观念，集中体现在河北、山西一带八路军的抗战摄影和版画创作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全面的讨论可能需要一本书的篇幅。本章以沙飞 1937 年和 1938 年拍摄的“战斗在古长城”系列摄影作为个案，讨论战争时期对于长城的再现方式和创作意图，以及沙飞摄影对毛泽东 1935 年《长征谣》中“不到长城非好汉”一语的重新阐释。沙飞拍摄的长城照片赋予毛泽东诗句新的含义，也折射出“长城”在解放区获得了广泛认同。这种认同为 1949 年以后的长城观念及图像奠

定了基础。

即如前文所言，本书特别关注图像。从根本上说，这是一本艺术史著作。不过本书的两个目标：对长城现代意义的生成做一个历史梳理，以及图像之于观念的建构性效力，都不完全是艺术史问题。在本书的论述框架下，图像既是一种能够发出声音的历史文本，又是具有独立文化逻辑的视觉语言；它们是历史的图像，本身也足以构成一部图像的历史。所以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可能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史，而是一部抗日战争时期的视觉文化史。

第一章 现代目光下的“长城”

1912年,《真相画报》杂志对上海与广东各市拆除旧城墙一事大加赞赏,随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最古最大的城墙是长城,那么长城该不该拆掉呢?答案虽然是不拆,但提出这个问题本身,仍可引发对于长城的思考:在20世纪初期,一个现代国家刚刚建立之时,人们如何面对长城这个中国最古老的建筑?长城又以何种方式,进入到现代世界?

1. 伟大的古物

在中华民国建立后的民国元年,《真相画报》第5期专门刊载“广东拆城之现象”“上海拆城之现象”“万里长城”三组照片,配有相关文字,展示中国古城墙的现代命运。第一组和第二组是上海和广州城墙旧貌、拆后残迹,以及拆除后改建的马路,另附有文字解说拆除古城墙的必要性:

上海为万国商业之中枢,租界六通四辟,车水马龙,毫无障碍,唯县城闭塞,有同圈禁,不独貽笑外人,对于我国民,亦有种种之妨害。商场贸迁,全待交通,人民卫生,必资空气,崇墉屹屹,环绕四周,交通既形不便,空

气定多秽浊，吾民何辜，受兹苦恼。^{〔1〕}

总结起来，城墙的负面作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 阻塞交通、妨碍出行；2. 不利空气流动，影响“人民卫生”；3. 城墙四面合围，“有同圈禁”，让外国人笑话。晚清以来，拆城提议络绎不绝，主要因素就是第一点，城墙的存在使城市只具备极少数出入口，限制了城市交通。至于卫生问题，已属可疑；“貽笑外人”，就更是莫须有了。

一旦城墙拆除，拓宽马路，架设电车，城市便能散发出一番新气象：

民国光复，扫去一切腐败政见，与民更始，前都督陈炯明入手第一着，既先拆卸城垣，以利交通。以粤省烟户稠密，衢道湫隘，一旦筑马路，电车、马车、自由车，长扬往来，真足为新世界新人物之纪念。^{〔2〕}

在《真相画报》编者心目中，马路上自由往来的电车、马车和自由车，构成了“新世界”的象征，而古老的城墙，则是“新世界”和“新人物”的对立面，阻碍了新世界的到来，是应该彻底铲除的对象。【图 1.1】

在这个走向“新世界”的视域中，中国所有的城墙，都发挥着当时人所认定的负面作用，均在该当拆除之列，其中自然也包括长城。但是编者又以为，长城可以例外：

〔1〕《广东拆城之现象》，《真相画报》1912年第5期。原刊物中未标注页码的，本文注释中也不提供页码信息，下文不再专门注明。

〔2〕见《真相画报》1912年第5期。